

社会学
论丛

第 1 辑



现代化进程中的 中国农民

主 编 贾德裕 朱兴农 郝同福
执行主编 周晓虹

南京大学出版社

此项研究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

主 编 贾德裕 朱兴农 郝同福
执行主编 周晓虹

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1998 · 南京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

主 编 贾德裕 朱兴农 郗同福

执行主编 周晓虹

*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 210093)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扬中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75 字数 343 千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305-03236-0/C·81

定价 18.00 元

(南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退换)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孔令智 叶南客 朱兴农

庄春地 苏 萍 张鸿雁

周晓虹 赵乐强 郝同福

贾德裕 黄 菡 (美)裴宜理

翟学伟 蔡少卿

现代中国农村变迁史论

中国农村和农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代序)

周晓虹*

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研究，自本世纪初起就一直是中外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社会学家十分关注的主题之一。究其原因不仅在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不仅在于中国众多的人口中农民占了80%以上；还在于中国的文明本质上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文明，我们民族的传统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都是由漫长的小农家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酿造的。因此，不理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就不能从根本上理解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和中国本身。

纵观本世纪内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主要的时期：一是从1919—1949年的30年，二是从1979—1998年的20年。在这两个时期之间尽管有长达30年的停滞甚至可以说是空白期，但在这两个时期中，社会科学家们思考的问题是有连续性的。有些学者，像费孝通，甚至在这两个间隔长达30年的学术期中都是十分活跃的人物。在这篇代序中，我们将以这两个

* 作者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暨社会心理学所教授，博士。

时期为中心，论及有关中国农村和农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然后对本文集的编撰动因和其中收集的研究论文给予简单的介绍。

—

对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最初是由在中国居住或旅行的外国学者进行的。在本世纪上半叶的几十年间，欧美和日本学者或抱着认识中国、认识中国社会的目的，或抱着为自己国家提供政治、经济与社会情报的意图，在中国不同的区域作了许多农村调查和农民研究。1919—1920年间，上海沪江大学教授D. H. 库尔普指导学生对广东潮州凤凰村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并于五年后出版了名为《华南乡村生活》的报告；1921—1925年，金陵大学教授J. L. 卜凯对中国七省17县的2866个农场进行了为期五年的调查，并于1930年出版了《中国农家经济》一书；再往后，日本社会学家林惠海和福武直在1939—1943年间六次调查江苏苏州近郊农村。^[1]除去这些规模较小的个人性质的学术研究以外，1908—1945年间，日本在我国大连设置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南满”）先后在我国东北、华北和华东进行了大规模的农村习俗和经济状况调查。其中最大的一项调查是1940—1944年间在华北进行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实施调查的日本研究人员声称这是一次“纯学术性的调查”，目的是“掌握中国农民实际生活中的社会习俗，了解活生生的中国农村社会的真实面貌”。^[2]这项规模庞大的调查虽因日本的战败而未能完成，但后来出版了由仁井田升编辑的六卷本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1952—1958年）。最后，在华东的调查于1939年和1940年分两个年度先后在嘉定、常熟、太仓和松江、无锡、南通等六县实施，其研究结果也先后在上海出版。

1949年以前，尽管由于战乱和贫困等原因使得从事各类研究

的条件极为恶劣，但由中国人自己进行的农村调查和农民研究也十分引人注目。1926—1927年间，李景汉指导燕京大学学生对京郊挂甲屯等四村160户家庭进行调查，并于1929年出版了《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一书；^[3]以后李景汉又根据自己以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社会调查部的同仁所进行的定县调查出版了《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年）。^[4]稍后于李景汉，年轻的费孝通1936年趁养伤之际，在江苏吴江庙港乡开弦弓村作了一个多月的深入调查。此后，他在人类学功能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写出了题为《中国农民的生活——长江流域农村生活的实地调查》的博士学位论文。这本译成中文后改称《江村经济》的著作，通过对“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论述，“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5]尽管只凭这本著作费孝通就赢得了终身的荣誉，但事实上无论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他都一直将农民及其社会生活作为自己毕生的研究课题。在此之前，他在新婚之际就偕妻前往广西象县花篮瑶从事农村调查，并在那里失去了年轻的妻子王同惠；在此之后，他与云大—燕大实地调查工作站的同事张子毅一起，调查了昆明滇池附近的禄村、玉村和易村，^[6]并先后写出了《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和《乡土重建》等以农村社会学为主题的理论著作。

除了上述实地调查之外，在此期间有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理论研究也在社会学界推广开来。先是杨开道，这位美国密执安大学的农村社会学博士，1927年回国后积极参与和组织农村社会学调查，并率先出版了《农村社会学》（1929）一书。几乎与杨开道同时，冯和法也推出了自己的《农村社会学大纲》（1929），不仅交代了农村社会学和农村社会的基本性质，而且以中国农村为主线，论述了农村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与问题，并涉及到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此后，言心哲的《农村社会学概论》（1934）、《中国

乡村人口问题之分析》(1935)及《农村社会学导言》(1937)等一系列著述,继续沿此方向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几乎与学院研究者同时甚至更早,中国共产党人在大规模地开展农民运动的同时,也进行了许多农村调查和农民研究。1926年1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创办了《中国农民》杂志。创刊号上刊登了毛泽东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土地革命的态度》,第3—5期则刊登了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和李大钊的《土地与农民》。1927年1月,毛泽东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报告》提出国民革命首先要有“一个大的农村变动”。^[7]兹后,中共地下党员、时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的留德博士陈翰笙在1928—1934年间组织了数十位研究者对无锡、保定和广东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调查;^[8]随后,张闻天带队于1942年对陕北米脂县杨家沟的农村地主经济进行调查,写出了《米脂县杨家沟调查》一书。^[9]40年代,一批同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西方学者来到中国的解放区,他们或对如火如荼的土地革命进行了细致的观察,或干脆投身中国革命:威廉·韩丁的《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和大卫·克鲁克的《十里店: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等著作成了西方世界了解中国革命的窗口。^[10]

二

1949年以后,随着社会学被打入冷宫,除了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的主题外,到1979年以前,在中国境内有关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研究基本停顿下来。在这30年中,不多的几项有关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社会学及社会人类学研究基本上是由外国学者或旅居外国的中国学者完成的,其中影响较大的包括:(1)旅美华人学者杨庆堃根据自己50年代初在广州郊区鹭江村的调查写成的《共产主

义过渡初期的一个中国农村》(1959)。(2) 1956年4月,新西兰人类学家 W. R. 葛迪斯沿着费孝通的足迹,在后者调查开弦弓整整20年后,来到中国江南的这个小村。在那里,葛迪斯看到了“今天开弦弓的人民,看来确实比二十年前,在物质上要富裕得多,而且他们有了更大的安全感”,但他同时也担忧“农民的生活没有什么色彩,村干部的深蓝色制服就是在新政权下千篇一律倾向的象征。”^[11](3) 威廉·韩丁根据他对人民公社时期陕西长弓村的再度调查,出版了《深翻:一个中国农村的继续革命》(1983)一书。^[12](4) 1975—1978年,美国汉学家陈佩华(Anti Chan)等人通过对移居香港的广东陈村村民的数百次访谈,写成了《陈村:毛泽东时代一个中国农村社区的近代历史》(1984),深入报道了人民公社后期中国农村的政治与经济生活。^[13]

1979年以后,当费孝通随着被解禁的社会学一并复出之时,中国的农村和农民研究又开始活跃起来。1980年秋,费孝通第三次踏上去江村之路。尽管为准备这年冬季将在英国人类学会授予他赫胥黎奖的大会上发表的讲演,费孝通只在开弦弓住了四天,但凭着对中国农民生活的了解和因社会学解禁与个人获奖而产生的双重喜悦,几个月后他却毫不费力地向他的听众——英国人类学的同行们生动地描述了中国农民在1949年后的变化。虽然费孝通向他的听众说,希望能够“用开弦弓作为一个观察中国农村变化的小窗口”,^[14]但自此以后他实际上将这个窗口越开越大。在费孝通的倡导和示范下,有关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研究又重新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在1979—1998年的20年间,有关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社会学研究称得上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不仅研究的论文和著作的数量远远超过前述第一个时期,而且研究的主题和内容也十分广泛。中国农村的改革、农民的生活状况、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小城镇)、农民的分层、农村教育和农民素质、农村

人口与流动、农村社会的分化与整合、农村社会组织和文化、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婚姻家庭、农村社会问题以及中国当代农村的社会变迁等问题都得到过程度不同的研究，而这些研究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学者们的注意力总是同中国农村及其变革的现实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能够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以及农民大批走出土地、家乡异地打工经商作为三大标志，将 1978 年后的中国农村变迁划分为启动、剧变和高潮三个阶段，那么，也就能够将中国农村社会学在这 20 年中的发展大致分为下述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 1979—1983 年，这一阶段的研究主题大多同 1979 年开始推进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关，许多研究论文和调查报告或积极为联产承包责任制举旗呐喊，^[15]或通过对农民收入的调查来论证改革给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的各种变化。^[16]此外，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已经突显出来，所以这一阶段也有一些研究者开始注意到这一议题。

第二个时期从 1984—1989 年，这一阶段的研究主题同乡镇企业的飞速发展及由此推动的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密切相关。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一批社会学家，将社区研究传统同此时的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现实相结合，提出了著名的“小城镇理论”，并使之很快成为研究热点。单是 1984—1985 年，与此相关的论文和调查报告就达 200 多篇。另外，有关农村的婚姻家庭研究在这一阶段的后期也出现过热闹的景象。

第三个时期从 1990 年至今，相对前两个时期而言，这一阶段具有这样一些鲜明的研究特点：（1）1989 年后席卷全国的“民工潮”，使得有关农民外流及其生存状态的研究同稍前开始的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研究一起成为农村社会学的两大热点。（2）农村社会学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拓宽，而其中许多研究议题都与农村工业

化、城市化和农民外流有关，有些甚至就是从中派生出来的。比如，因农民外流而产生的人口与流动问题，因农村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农村社会的分化与整合、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等。(3) 随着中国社会学的不斷成长和成熟，农村社会学的学科探讨和理论建树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在 90 年代的前半期，学界出版了许多有关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和农村社会学体系的论著和教材，其中代表性的有《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王沪宁，1991)、《改革中的农民问题》(陆学艺主编，1992)、《中国农村的工业化和社会分化》(王汉生，未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1992)、《血缘与地缘》(王晓毅，1993)、《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历史与运行机制》(马戎等，1994)以及《农村社会学》(吴连怀，1992)等。而在 90 年代的后半期，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成熟，一批以特定农村社区的变迁为研究对象的专题性著作相继出版，其中王春光的《社会流动和社会重构》(1995)以京城“浙江村”为研究个案，对农民流动和中国新型城乡关系的缔结作出了说明；曹锦清等人的《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1995)和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1997)为我们提供了 1949 年后尤其是人民公社时期中国一个普通村落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变迁的全景式报告；折晓叶的《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1997)将前述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农民外出流动两大热点主题置于对一个农村社区的观察和研究之中，描述了在中国农村的非农化过程中，由外来力量和村庄内在的经济社会结构的相互作用所推进的乡村社会变迁；王铭铭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1998)探讨了传统村落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最后，周晓虹的《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1998)则将对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探讨深入到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及其变迁的层面。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和中国农民的社

会生活的研究与探讨不仅出现在社会学界，而且也出现在历史学特别是由历史学与社会学交叉而成的社会史学界。在中国农村发生巨大变化、中国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时代，力求“描绘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17]的社会史不可能不对农村和农民的生活在本世纪尤其是近 20 年中的变化产生浓厚的兴趣。因此，几乎在中国社会史复兴的同时，随着研究视角从国家上层移向社会大众，历史学家们继 50 年代起的“农民战争热”后又一次将目光投向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他们提出，“中华民族是在传统的精耕细作农业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民族，而中华民族的八千年历史可以说始终就是一部农民史”，^[18]因此“中国社会史不研究农民是不可想象的”。^[19]这种和传统史学大相径庭的观点，在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因美国汉学家黄宗智的两部以中国近现代农村经济史和社会史为主题的著作在境内的翻译出版而受到激励。这两部著作的第一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使用的史料全部来自前述满铁调查；第二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的前半部分使用的史料取自前述费孝通、林惠海和满铁调查部 30 年代分别实施的对长江三角洲八个村庄的研究，后半部的史料则取自黄宗智本人 1983—1985 年间在上海附近的松江县华阳桥乡的六个自然村所作的实地调查。在 1985 年出版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作者就以充足的史料为依据，提出“不要把商品经济的发展简单地等同于向资本主义过渡”；^[20]而到了《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作者的观点进一步成熟。他通过引入“过密型商品化”的概念，描述了同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商品化进程。这“过密化”（involution）在前一本书中被译作“内卷化”，指的是那种“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总产量的增长”的现象；而“过密型商品化”则指的是由过密化相伴随或推进的商品化进程。具体到长江三角洲，几个世纪中蓬勃发展

的商品化进程并未必然导致小农经济的解体，反之却是它的进一步完善。因为这里的商品化不是由经营式农场主的牟利活动推动的，而是由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推动的，是以密集的劳动投入为代价来换取的，因此并不存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小农生活长期仍旧处于糊口水平，中国人口的大部分仍然束缚于粮食的生产。黄宗智将此称之为“过密型增长”，即没有发展的增长。最后，作者令人信服地将1979年后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归结为对这种“过密型增长”的突破，“正是乡村工业化和副业发展才终于减少了堆积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动力人数，并扭转了长达数百年的过密化，”^[21]使中国农村走上了真正的现代化之路。

中国的农村和农民研究为社会史学家留出的回旋余地要远远大于黄宗智的个人兴趣。一进入90年代，在转换史学视角、掀起“史料革命”的呼吁下，一批以中国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社会史学著作相继出版，其中最富代表性的有：《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陈吉元等，1993）、《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朱德新，1994）、《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齐涛，1995）、《中国近代流民》（池子华，1995）、《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温锐，1995）、《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曹幸穗，1996）、《中国农民变迁论》（孙达人，1996）、《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秦晖、苏文，1996）等，这些研究从历时态的角度深刻描述了千百年来尤其自近代以来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状况与变化。

三

在简单探讨了本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和农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之后，我们回过来谈论这本题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的文集。这本文集中收集的23篇研究论文大部分来自1995年10月

由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南京大学社会心理学研究所、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昆山市周庄镇人民政府联袂主办的一次题为“传统与变迁：中国农民的社会心理”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也有一些是在这次会议以后完成的有关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研究论文。从这本文集的书名我们能够知道，其中收录的论文无论出自哪位研究者之手，无论其讨论问题采用的是哪种研究手段或方法，其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农村在近 20 年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变迁及中国农民在这一变迁中的遭遇。从这样的意义上说，这些研究自然也构成了前述有关中国农村和农民研究的历史的一部分。

同前述 20 世纪中有关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社会科学研究相比，这本文集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其中收集的研究论文不仅涉及到中国农村的宏观社会结构及其变迁，而且更为关注发生在中国农民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上的各种变化。我们编撰这本文集和两年前召开那次有关农民社会心理及其变迁的研讨会的动因是一致的，都是希望社会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在进行有关中国农村的宏观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研究的同时，给予微观的农民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以应有的关注，而后一方面的研究比较而言是受到忽视的。^[22]显然，如果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偏颇不能得到有效的纠正，我们就会犯费孝通先生所言“只见社区不见人”的错误。^[23]

这部文集中收录的 23 篇论文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的五篇论文从历史与现实或者说从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切入主题。秦晖的论文通过对历史与现实中的各种农业市场的“价格-供给”反应的分析，对农民的经济行为的“理性”与“非理性”之辩给予了深入的经济史和社会史考察。作者认为，传统农民社会心理的“非理性”特征源于宗法共同体对个性的压抑，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作为交换主体的农民摆脱了对共同体的依附之后，他们的

“理性”就能够健全起来。孙达人的论文从对《河头村志》的推荐开场，提出了有关农民史研究的“只有尊重才有发现”的朴素原则。作者以为，了解由农民自己撰写的各种族谱和村志是准确获悉农民心态的可靠途径。和上述从社会史学角度出发的论文不同，具有社会人类学背景的王铭铭和郭于华的论文不仅涉及的主题十分接近，而且观点也大体一致：前者从经济发展过程中民间传统文化的“死灰复燃”现象入手，批评了现代化理论的局限性，并对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是否存在发出了质疑。通过对福建塘东村的田野考察，作者证实了民间传统的高度适应性，并论证了它对现代化的正性作用。后者则以传统亲缘关系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演变及其角色作为研究宏观社会变迁的视角，力图在传统与现代化的融合及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持续存在寻找坚实的理由。最后，余红的论文从宗法制度（观念）、聚族而居、家庭功能和行政功能的消长、农村社区文化的贫乏以及农民的社会心理五个方面论述了当代中国农村宗族势力复活的内在根源。

同第一部分的文章相比，第二部分的四篇论文以其对现实的农村社会的关注而体现出清一色的社会学色彩。刘倩的论文以遐迩闻名的“南街村”为研究对象，论证了在中国中部乡村工业基础薄弱的地区，以农业为重心建构社区经济体系、走农业产业化道路的可行性。作者同时也指出，在这个有“最后一个人民公社”之称的农村社区，目前实行的高度集权体制有可能隐藏着压抑个性、滋生蒙昧主义的隐患。朱又红和日本学者南裕子的论文从村民委员会入手，描述了1984年后在中国大多数农村社区出现的不同于前述“南街村”的社会变迁情景。他们清楚地阐述了脱胎于生产大队的村民委员会从中介行动者转变为独立法人行动者所具有的结构创新意义。李培林的论文谈论的是在中国沿海地区有“半壁江山”之称的乡镇企业，因今天的乡镇企业已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雷同，作者称其为“乡村里的都市工业”。不过，和以

往这方面众多文献的视角不同，这篇文章是从天然的土地社会保障、家庭伦理与组织成本、廉价劳力和创业精神、成本外部化与送礼艺术、法人社会等切入，来阐释诸如“离土不离乡”、血缘关系在乡镇企业运作中的地位 and 作用等问题的。胡必亮的论文涉及的也是社会变迁问题，不过他关心的是在变迁过程中农民的婚姻状况。通过对王垌村村民的婚姻状况的考察，文章认为，一定的婚姻状况既是社会变迁程度的反映，而其进步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整个社会的进一步变迁。

第三部分尽管也只有四篇文章，但研究的内容却包括了进城农民这一特殊群体的结构和行为（心理）两个方面。吴鹏森的论文尽管也谈论到进城民工的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但其主要关注点是民工潮的形成，进城民工的构成、群体稳定性、地区分布、组织状况以及其所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一句话，他所作的主要是一种结构性分析。与此相反，叶南客和李芸讨论的是因中国农村急速的工业化所导致的农民传统人格或社会心理的转型问题，他们证实，离开土地走进城市的农民工是中国新移民中流动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一个阶层，也是在社会心理上最接近“边际”状态的一群文化移民。李强的文章则触及到进城民工和城市市民群体冲突的社会心理层面，他分析了前者对后者的不满情绪和后者对前者的歧视态度。最后，吴作富的论文则从关系网络的角度，分析了农民进城就业的途径，提出农民依据非正式关系网络走进城市，是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等中介组织不健全下的一种补缺性选择。将这样几篇文章放在一个单元里提示我们，在社会学研究中，有关社会现象的行为性（心理性）分析同前述结构性分析常常会有相得益彰的效果。

接下来第四部分的五篇论文涉及的主题大多能够列入前述社会现象的行为性分析或社会心理学的范畴。石秀印的论文以 1949 年后中国农村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为经线，以农村经营行为中的

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取向为维度，从一个侧面讨论了农民和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论文试图说明，不同时期农村经营中不同行为取向占主导地位，是农民的社会要求和政府的政治要求相互作用的结果。折晓叶和陈婴婴的研究显然是以中国农村 1979 年后的社会分化为前提的，这一分化极大地改变了农民的职业及农村的分层结构，大量的农民向非农的职业领域转移。不过，这篇论文的中心不在这种分化或职业结构本身，而在不同的职业在社会公众中所获得的不同的主观评价（声望），这种评价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整体心态的一种反映。接着的两篇论文，一同农民的家庭观念及其变迁有关，一与农民的生育意愿有关。众所周知，无论是家庭还是生育，原本都是农民传统性体现的最为充分的领域。不过，从王金玲和黄菡分别提交的论文来看，在近 20 年来的社会变迁作用下，即使在这两个领域，农民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方式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而推动这种变化的最主要动力是在江浙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出现的非农化趋势。最后，张敏杰的论文以中国农村改革的“试验区”温州为背景，对变迁中的农民心态及其社会环境因素给予了讨论。

文集最后一部分收录的五篇论文可以视为一个自成系列的专题研究，它们的研究对象一是由浙江温州的进京农民组成的北京“浙江村”，另一是江苏昆山的周庄镇。王汉生等四位学者的论文提出“浙江村”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力”的流动，而是带着诸种经济与社会资源的经营者的流动。这使得“浙江村”人无论是进入城市的方式，或是在城市中生存的方式都与一般的进城农民迥然不同。翟学伟的论文从分析周庄的家庭结构入手，讨论的是和前述郭于华的论文十分接近的主题，即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家庭制在潜功能上是否能有一种弹性，以利于现代经济组织的建立。另外三篇论文不仅都涉及到周庄镇和“浙江村”的比较研究，而且它们谈论的都是这两地农民在现代化